

见微知著的“人间瓷话”



彭善国著《人间瓷话——中国古陶瓷的文化解读》，书名取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之意，从“辨名实”“论器形”“说纹饰”3个部分展开，共收录22篇专论。此书虽说不上是鸿篇巨制，每篇议题也并非长篇大论，但大都关乎古陶瓷研究中的热门议题，厘定旧说，开拓新意，体现了作者在古陶瓷领域见微知著的深厚学术积淀，亦可看出作者在面对诸多被广泛采引的古代文献时，不盲从既有的甚至是被多数人接受的认知，而是深究细研，广采博引，提出质疑并引出新的观点。尽管作者自谦此书为科普读物，但展读之间，却能感受到作者多方面的学术追求。我认为，此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该书每篇论说都从与古陶瓷相关的古代文献发起讨论。从文献梳理入手，详细论证文献的本意，并结合了考古资料加以证实。唐宋时，中国制瓷业进入大发展时期，瓷器的生产、使用和鉴赏多有文献记载，后世谈瓷文献也多有转载。然而，古陶瓷研究者在使用这些文献资料时常常出现问题，或不求甚解，或望文生义，因而常常出现误读或舛误。如果更全面地收集资料，采用不同种类的文献记载并加以辨析，便可以洞悉其中一些问题。

较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古陶瓷研究

中屈指可数的悬案之一——柴窑。柴窑虽然被认为是五代后周的官窑，但最早的文献记载却出现在明初的《格古要论》中，特别是在记录产地时提到“出北地”，于是一些学者将其对应为陕西隋唐时期还存续的“北地郡”，这里也是唐宋时期耀州窑的产地。20世纪后期耀州窑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发掘，清理了五代时期的地层，出土了许多质量精良的青瓷。随后学者根据窑址出土的资料，认定五代到北宋初一些高等级遗迹中出土的精美青瓷是耀州窑的产品，如辽祖陵发掘的耶律李胡墓、陕西彬县冯晖墓和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等出土的青瓷。于是有一些学者便将五代耀州窑认定为柴窑。

此书以《雨过天青云破处——“柴窑”的传奇》为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说，传奇两字颇为贴切，文章首先梳理了文献记载的变迁，从曹昭《格古要论》原著的记录，王佐增补版的扩展，到明代后期“四如”（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描述和周世宗御批的出现，以及历来关于柴窑所在地的几种观点，最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首先，从制度上看，无论是后周还是北宋，贡御用的官窑很可能是在都城开封烧造的。关于后周汴梁城内有窑场，文献记载尽管来自类书《册府元龟》，但这一观点颇需论证。其次，《格古要论》中多次出现“北地”的地望，实际指北方地区而非“北地郡”。因此，尽管五代时耀州窑青瓷的生产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最可能是所谓“柴窑”的瓷器品种，但柴窑生产地点并不排除在开封的可能。这一观点笔者十分认同，也同作者有过交流和相互启示。

目前所见唐长安醴泉坊窑址、唐东都洛阳东城义勇街窑藏（很可能是窑址）等具有官作特点的遗址，都可证明唐宋时期会从高水平制瓷中心征调工匠，甚至携带制瓷原料，到都城进行贡官贡御产品生产。杭州老虎洞南宋修内司官窑甚至坐落在距皇城直线距离仅几十米的地点。结合文献记载，北宋“汴京八作司”所属的“青窑作”位于京城内的“东窑务”等机构，说明柴窑应该也在都城进行瓷器生产。

此外，该书《碎佩丛铃满烟雨——唐宋时期的击瓿与水盂》《湘窑泛轻花——关于“湘窑”的解读》《真实还是传奇——渤海

国“紫窑盗”问题》等文章，涉及的议题虽然以往已颇有讨论，但此书收集了更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对相关问题有新的认识。展卷后，收益良多。这体现了作者在研究古代陶瓷的某个问题时，对相关文献资料的引用秉持认真务实的态度，作者参稽多种相关文献进行对比研究，尽可能揭示文献记载的真实含义。

第二，该书揭示了，浩瀚的古代文献史料中一些看似细枝末节的记载，在陶瓷文化研究中却关系重大。宋代是我国史料最丰富的时期，在不同种类的官修正史以外，还有大量的文人笔记、方志等多种不同的史料。在印证文物考古材料的过程中，仅凭单一的史料难以准确把握原意，容易出现误读，但广泛参稽多种史料后，问题便豁然可解了。如该书《颜色比琼玖——“青白瓷”名称问题刍议》一文，极为细致地摘取了大量宋元文献、诗词关于青白瓷相关称谓的记载，其中北宋李廌《杨元忠和叶秘校腊茶诗相率偕赋》“也容双井白过磁”一句的自注中写道，“江南双井，用鄱阳白薄盏点鲜为上”。作者又提及南宋刘学箕《方是闲居士小稿》中提到“番（鄱）阳白瓷方斛者四”，从而解读出“鄱阳白瓷”才是两宋时期景德镇青白瓷的真正称谓，后世人所称的青白瓷，就是宋人眼中的南方窑场所产白瓷。

第三，该书通过对一个个历史细节的拾遗与回顾，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陶瓷文化轶事，令读者感受到作者对中国陶瓷文化的执着与热爱。每一个瓷器造型和每一个流行纹饰都是一段故事，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古人的丰富情感。比如，用瓷碗盛水调节出不同音调的“击瓿”，引出“击瓿楼”的故事，展现出瓷器的多种用途；通过解析“寒山拾得”“鹦鹉啄桃”“饮中八仙”“水浒故事”等纹样，以及新安沉船出土的元代釉里红“红叶题诗”盘这种独特器物背后的故事，让我们能够通过静谧瓷器，窥见一段段历史的涟漪，透过陶瓷了解不同朝代的背景和文化变迁。又如《累置瓷隐轡——说北宋宜阳窑》一文，通过对北宋司马光叠石溪窑窑畔别墅及其友人范镇诗作中对窑窑生产的描绘，让我们对不知名的宜阳窑及其产品有了较多了解。该书提示我们，古代中国陶瓷的形制和纹样，不仅仅是工艺的体现，更是文化、信仰、生

活方式等多重因素交织后的结晶，体现了陶瓷工匠的智慧和追求。

第四，作者用穷尽资料的态度，全面收集考古资料，科学合理地梳理了若干陶瓷器的源流和发展情况，并参考相关文献记载，纠正了一些器物研究过程中产生的臆想和附会。比如《圆池类璧水——说隋唐时期的陶瓷辟雍砚》及《吟来拂笔砚——洛阳白居易宅院遗址出土砚台考述》两文，运用考古出土的众多实物资料，梳理了隋唐时期陶瓷辟雍砚的装饰及形态发展，并厘清了其流行的时代，据此认为唐洛阳城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出土的几方圆形多足辟雍砚，其实早在白居易生活的时代以前，就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可能并不是白居易生前使用的文具，作者以此个案，提醒研究者在器物研究过程中要有慎重、严谨的态度，警惕随意拿名人来猜测比附具体的文物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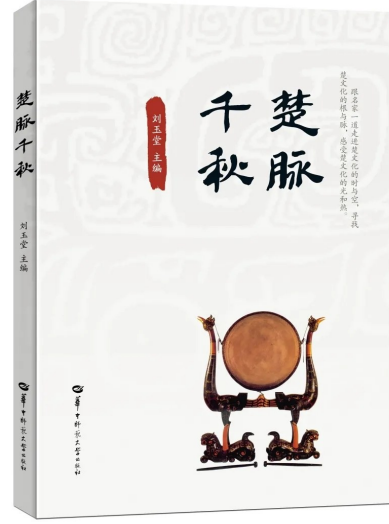
书中的多项研究成果都说明研究应当切忌片面。不加辨析甚至是断章取义地理解单条文献记载，是电子文献检索系统出现后常犯的错误。不论是对考古资料的收集，还是对文献的查阅，都应尽其可能穷尽材料，将古代文献、考古发现以及博物馆馆藏文物相结合，来探讨陶瓷生产和使用出的一些重要问题，避免误读和对资料的曲解。该书展示了一种全面收集资料，严谨并多视角讨论问题的研究方法。应当指出，该书仍有较多可拓展的研究空间和资料解读的余地，比如《碎佩丛铃满烟雨——唐宋时期的击瓿与水盂》一文，详论了“击瓿赋”中所述“击瓿楼”的源流和含义，如果再能与唐代四川地区的瓷器生产状况，特别是邛崃窑的产品和特点做一些关联探讨，会更有现实的学术意义。其他地区用于击瓿的瓷器是哪些，也有讨论的余地。此外，书中“辨名实”单元所收9篇论文，与实际的瓷器品种结合尚不够紧密，配图较少，在前68页中几乎没有配图，显得有些单调，今后再版时应考虑增补。

（原载《光明日报》，作者为秦大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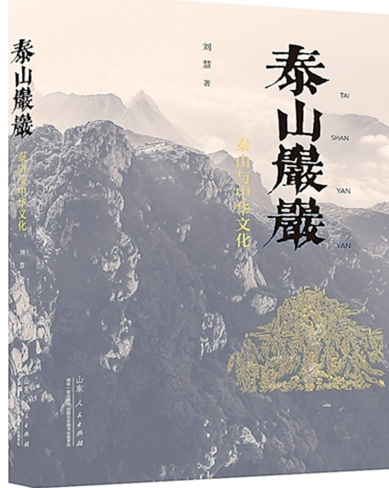
新书推介

《楚脉千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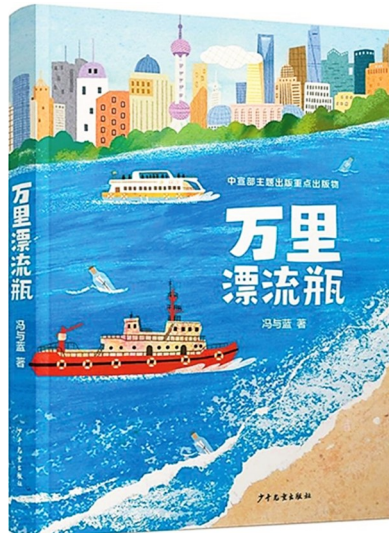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该书由著名楚学研究专家、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玉堂主编，带领读者走进楚文化的时空，寻找楚文化的根与脉，感受楚文化的光与热，通过传颂历史故事，诠释时代精神，启迪今人思维，理趣兼备、雅俗共赏、图文并茂。

《泰山岩岩：泰山与中华文化》



内容简介：本书展现了泰山作为中国首例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魅力价值，阐释了泰山所象征的精神气概。

《万里漂流瓶》



内容简介：小说讲述了一个漂流瓶串起的两个家庭的跨国友谊故事，让小读者在开阔眼界的同时，理解建设海洋强国的意义。（本报综合）

夏日读书好消暑

口述/杨馨 整理/本报记者 陈希子

夏日的阳光总是格外炽热，仿佛要把大地烤得滚烫。然而，对于热爱读书的我来说，这却是一个沉浸在文字世界中的绝佳时节。因为书，就像一把遮阳伞，为我遮挡了烈日的炙烤；又似一阵清凉的风，吹散了内心的燥热。

书房，是我夏日的避暑胜地。这里没有烈日的炙烤，没有蝉鸣的喧嚣，只有微风轻拂，书页沙沙作响。我将房间布置得简洁而雅致，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从古典文学到现代小说，从哲学著作到自然科学，每一本书都像是一个神秘的宝藏，等待我去开启。

在书房的角落，我放了一把藤椅，旁

边是一盏柔和的台灯。夏日的午后，阳光透过纱窗洒进来，斑驳陆离。我坐在藤椅上，翻开《诗经》，那些古老的诗句如同清泉般流淌进我的心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仿佛置身于那片苍苍蒹葭之中，清风拂面，水波荡漾，内心的燥热瞬间被驱散。

尤其每到夜晚，蚊虫的嗡嗡声和远处的蛙声此起彼伏，让人难以入睡。然而，只要手中有一本书，我就能在文字的世界中找到一片宁静。读一本励志的传记，那些伟大的人物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常常让我深受鼓舞。海伦·凯勒在无声的世界中，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创

造了生命的奇迹；贝多芬在失聪的困境中，依然谱写出震撼人心的乐章。他们的故事让我明白，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只要心中有梦想，就一定能够找到前进的方向。

读着读着，我会抬头看看周围的环境。院子里的花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远处的蛙声此起彼伏，天空中繁星点点。这些平常的景象，在书的映衬下，变得格外美好。我突然发现，生活中的美其实无处不在，而夏日静心阅读，也培养了我对生活细微美好的感知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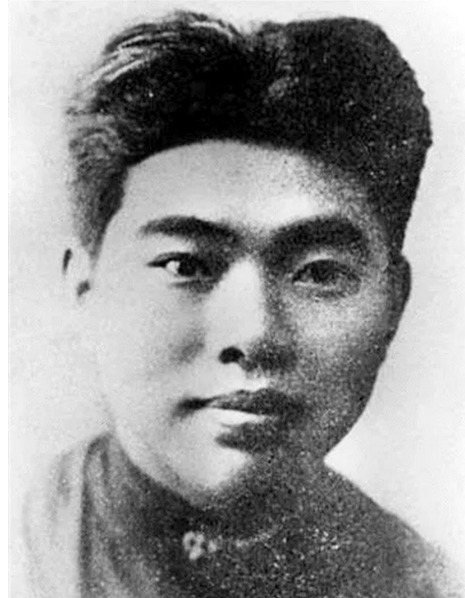
夏日读书，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它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找到一片宁静的

天地，让你在喧嚣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平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常常被各种碎片化的信息所困扰，很难静下心来思考。而沉浸读书，却能让你放慢脚步，聆听内心的声音，感受生活的美好。

喜欢夏日读书，喜欢在这炎热的季节里，与文字为伴，与思想同行。因为我知道，只有通过读书，我才能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季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美好。

我的书房

青年楷模何功伟



何功伟，又名何明理，化名何彬、何斌。1915年出生于咸安区桂花镇白墩村，1941年牺牲于恩施。

（上接第6期）

天亮后，经排查，学校里没有同学失踪。但不久传来消息，住在家的同学，有3人被捕了。到中午时，又得到消息说，全市有十几位同学被捕。此次行动的烈火还未燃起来，就被杨永泰派军警扑灭了。

第三天早上，“省高”学校当局宣布，要派学生去省政府听杨永泰“训话”。何功伟和学代会的代表们都不愿去听“训话”，学校只好派些已

经被国民党收买的学生去。这些学生回来对何功伟们传达说：“杨主席（永泰）说了，天下的事哪有不论谁是谁非的？现在你们动，我认为盲动，以后再要动，我就认为你们是反动。”

何功伟对杨永泰的“训话”，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他说到：“蒋介石反动政府最害怕的是工人罢工。因为粤汉铁路工人罢工，他们集中在武汉的军队就调不到广西去。这说明我们的宣言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所以他们摆出狰狞面目，镇压我们学生运动。”

不久，湖北当局逮捕学联负责人姚树森，严令通缉捉拿何功伟，一些学联积极分子同时被学校勒令退学。

当时正临近暑假，一天，在鄂南高中（现武汉第十中学）教书的钱远铨到省教育厅找其父亲（钱亦石）的老同学，担任第三科科长的熊莲城，尚未开口说话，熊莲城便将钱远铨拉到会客室外的一个偏僻小巷内，对钱远铨说：“你还是在武汉？你还不走？上面开了会，有个决定，学生反对内战，里面有共产党，对学生的几个头头要动手了。你也赶快走！”钱远铨回到：“我没有搞什么。”熊莲城说：“你还没有搞什么，有人密告你，说你是你父亲派来的代表，何功伟不是经常到你住处去吗？你要赶快走，否则要出危险的。见到你的老乡（何功伟）也叫他赶快走，年纪轻轻的，被他们抓去了，划不来。”

钱远铨告别熊莲城，在返校的路上经过省高，就进去找何功伟。恰逢何功伟不在校，便托一个同乡转告他，说有要紧的事找他，让他一回省高就到钱远铨住处的鄂南中学来。钱远铨回到学校后，便作好了转移准备，找到校长说，要到上海进修，要学校给予证明。何功伟吃了午饭就来找钱，钱远铨把情况告诉了他。

何功伟说：“怎么办？恐怕要抓一群。”他说，他也想到上海去，但没有熟人。钱远铨便给他写了一封信，介绍他去上海找钱父钱亦石。当天，何功伟就离开武昌，衣服、书籍都没有拿。当天下午，临近毕业会考，教务主任到何功伟寝室宣布：何功伟因操行不及格取消会考资格。说完后又在何功伟的书籍中将“会考证”收走。何功伟得到钱远铨通知后，把情况通知了一些人，作了安排，当晚就过了汉口，来到何功伟家。当时，何功伟父亲从乡下来武汉，住在功德家。父子两人见面后，相互争吵不断。何父说：“国家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你管这些事做什么？”何功伟便和父亲讲道理，两人一直辩论到第二天早上。期间，何功伟也在得知要抓人后，赶过江回家报信，并把消息告诉何功伟。何功伟听完消息后，写了一个条子，请功楷交给懿川女中一个郑姓朋友。

另外，何功伟还请人送信给同学陈光明，在信中说，他因政府搜捕甚急，武汉不能再待下去了，决定清晨秘密乘轮赴沪，希望陈光明和其三弟帮助掩护上船，办法是要陈和其三弟事先安排好一辆自行车，清晨X点到达芦沟桥路X号住宅（堂叔何文炳家）前，响铃为号，他马上就出来，骑车去码头，然后陈再去码头找送行的同学取回自行车。

当天傍晚，陈光明和其三弟就去芦沟桥路察看，找到了X号住宅。第二天清晨，何功伟在何功楷的护送下，从何功楷家后门穿过，来到堂叔何文炳家，并在那里按旧时下层社会打扮，将头发剪光，上下穿旧布短褂裤，配一副有色眼镜。时间到后，陈光明和其三弟按响车铃，何功伟手拎小包，从内面快步走出来，从陈的三弟手里接过后，就骑着朝江边奔去了，在

胡恪恭的护送下坐日清公司的船离开了武汉。

上海避难投革命

到上海后，何功伟按照钱远铨给的地址找到了钱亦石。在钱亦石的帮助下，进入正始中学读书，并作为湖北学联代表介绍到全国学联工作。他化名何明理，负责协助唐守愚与各地学联通讯联络。他为人朴实，态度谦虚，待人诚恳，勤学好问，对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工作态度勤勤恳恳，无论什么任务，总是能按时间、按要求完成。同时，他头脑灵敏，文章也写得清晰简练，很快引起唐守愚的重视。

1936年8月，负责全国学联工作的胡乔木（或王瀚）到上海检查工作。唐守愚向胡乔木作完工作汇报后，也把何功伟的工作情况和思想情况一并作了汇报，并提出是否可以考虑吸收何入党。胡乔木（或王瀚）认为何功伟对共产主义有认识，工作又积极，经进一步了解后，可以发展他入党。唐守愚通过张执一、陈家康等与何功伟有工作接触的党员的意见，他们都赞成发展何功伟入党。唐守愚向何功伟提出入党问题。何功伟回答考虑。何功伟征询了何伟、张执一等人意见，两人均鼓励何功伟参加组织。不久，何功伟正式向唐守愚提出入党申请。8月，在唐守愚的主持下，在全国学联机关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入党后，何功伟没忍住与同乡钱远铨分享自己内心的喜悦。有一次，大约是1937年元旦，何功伟、钱远铨、钱远镜三人看电影《壮志凌云》后回到钱远铨的住处，睡在床上，何功伟忽然问钱远铨：“你晓不晓得你父亲是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之一？”钱远铨反问何功伟：“你怎么知道？我只知道他‘文总’的负责人和中共党员。”何功伟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的组织问题解决了！”钱远铨很高兴地问：“介绍人是谁？”何功伟说：“是乔水介绍的。”

接着，他们又谈到武汉一二·九学生运动。何功伟告诉钱远铨，全国学联总结过一二·九运动，认为北京搞得最好，上海其次，武汉第三。北京学运有华北局领导，上海也有地下市委领导，武汉地区白色恐怖厉害，地下组织遭到很大破坏，是否有地下党领导，不得而知。何功伟告诉钱远铨，他曾猜想是冯乃超、孔罗荪等同志代表党联系学运，因为当时学生提出的标语、口号、传单等都经过冯乃超修改过，冯还指导他们如何同反动当局斗争，乃超不在家，他们就去找孔罗荪，孔不像乃超能当时解答，总是要他们约定时间再来说。

1937上半年，何功伟在上海正始中学毕业后，考上上海法学院。此时，因为要承担大学学联的秘密工作，何功伟住在校外，每月伙食费、房租要花十三、四元，比住在学院贵些。他告诉钱远铨，住在外面对方便些。此时，何功伟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是愉悦的，从不愁眉苦脸。有时他去市中心，就住在钱远铨那里（法租界金神父路群贤别墅金星洗染15司2楼）。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学联宣布解散。何功伟被调到青年救国服务团工作。早在5月份，何功伟便与救国服务团的前身——上海业务集体旅行团有过工作接触。当时钱远铨、毛梦觉和新华艺专同学组织的读书会成员，受了北平一些大学生组织的西山集体旅行团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的启迪，一起商量，也要在上海搞一次集体旅行，地点选在一二八事变的旧战场一带，向乡村农民宣传抗日。

《何功伟烈士传》连载⑦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主办